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未建交国家/冯建伟主编.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1

(中国驻外记者文丛/高秋福主编)

ISBN 7-5011-4279-3

I. 在… II. 冯…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风俗习惯·世界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862 号

在未建交国家

主 编 冯建伟

副主编 熊仲琪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插页 2 张 275,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279-3/G·1576 定价: 21.00 元

序 ❖

郭超人

从新中国第一批“红色记者”迈出国门，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向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文字与摄影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国驻外记者文丛》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记录汇编。

翻开这一页页《文丛》，人们可以透过历史的烟云看到，中国驻外记者既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传播者，又是我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标志着第三世界团结奋起的万隆会议上，他们率先将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播于世。为此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永远缅怀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血案中罹难的五位中国记者。在谱写国际关系新篇章的乒乓外交中，我们的记者自始至终是目击者和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庄严神圣的时刻令记者铭心刻骨。这些往事在记者的笔下依然熠熠生辉，给人以鼓舞和启迪。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说，文学就是人学。其实，新闻学何尝不是人学！采访和报道当代的新闻人物是新闻记者的重要职责。《文丛》用较大的篇幅对当代著名的政

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作了精彩和独到的描述。他们有的历经坎坷，仍矢志不渝；有的热爱生命，讴歌光明，在他们身上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有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也有的人违背潮流，昙花一现，被历史 and 人民所唾弃，他们的经历从反面令人警醒和思索。

《文丛》中有一个分册，叙述了记者在跟随我国三代领导人出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勾勒出我国领导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采，他们为世界和平，促进社会进步和增进人民友好合作所作的突出贡献，以及作为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这部《文丛》在描绘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驻外记者自身的成长过程和良好的精神风貌。他们中有些是耄耋之年的前辈，当年就是通过他们的报道，我了解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事；有些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后生，为上前线采访曾一次次来我办公室请缨。有人说，记者应该是这样的一些人，别人把你从大门赶出去，你又从窗口跳进来。正是这样。为了发展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和沟通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他们三上山城拉巴斯，五进中非的布隆迪。像将士一样，他们在出征之际，都暗暗立下“马革裹尸”的壮志，有人受过伤、流过血、受过围困，甚至惨遭关押。他们远离祖国亲人，时常在人地两疏的环境中孤军奋战。有的记者，老母去世时，不能返国奔丧尽孝；儿女呱呱坠地时，正在异国地震现场。多少年、多少次，战争、政变、灾

情，我们的记者总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国驻外记者忠诚于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高尚情操。作为一个中国同行，我每每为之感动和自豪。

虽然这200多万字的《文丛》很难囊括50年的世界巨变，但正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一滴水可折射太阳。透过这套《文丛》，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看到人类社会多姿多彩同时又多灾多难的生活画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岁生日之际，这套《文丛》作为中国驻外记者向祖国母亲的献礼，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还有400多天，我们将迈入新的世纪。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回首往昔，是为了更坚定地迈向未来。新的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时代。我祝愿中国驻外记者同行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如既往地讴歌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促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国读者更广泛地了解世界，也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写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

1998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

序	郭超人	1
交往、沟通、理解		
通向中日建交之路	吴学文	1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刘德有	6
邻邦开门迎新客		
记者先行到老挝	姜庆肇	30
历史的见证		
“小球推动大球”追踪记	高 梁	44
“乒乓外交”启动时		
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纪实	许必华	64
前奏与机遇		
闯开通往以色列“禁区”之路	穆广仁	75
叩击神秘的犹太国之门		
建交前三访以色列	高秋福	82
为了交往和友谊		
记者先行闯非洲	王 殊	113
穿梭采访传友谊		
60年代在非洲未建交国家的经历	杨 翊	121

活跃在新独立的国家		
第一次采访东南部非洲纪实·····	高 梁	129
一袋绿豆和一瓶汽油		
在非洲未建交国家的记者生涯·····	李翼振	148
新中国的友好使者		
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日子·····	陆明珠	157
首访东非古国		
肯尼亚的一段难忘经历·····	王德铭	166
曲曲折折采访路		
五访“非洲的心脏”布隆迪·····	高 梁	174
沸腾的海滨之国		
吉布提独立前的采访·····	王敬诚	190
一次不寻常的采访		
首访马拉维纪实·····	陈一飞 李 毅	200
历史的一刻		
纳米比亚争取独立进程纪实·····	熊仲琪	204
骤雨过后总要晴		
中国同南非建交前后的采访·····	刘也刚	215
打开美国“后院”的突破口		
古巴独立之初采访纪实·····	孔 迈	229
走进陌生的世界		
回忆拉美十一国之行·····	吴永恒	238
难忘拓荒岁月		
从巴拿马到多米尼加·····	吴永恒	254
谒见总统		
驻哥伦比亚记者生涯片断·····	邱 陵	275
“你们是中国的代表”		
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记者工作纪实·····	许必华	280

在格查尔鸟的故乡

采访危地马拉纪实…………… 郭伟成 294

三上山城

玻利维亚采访纪实…………… 王树柏 304

波恩往事

忆新华社波恩分社的创建…………… 夏治沔 311

从记者到大使

我在联邦德国当记者的经历…………… 王 殊 318

初访里斯本

中葡建交之前的采访活动…………… 沈定一 332

交往、沟通、理解 ❖

通向中日建交之路

吴学文

30 多年的记者生活已成过去，当年报道的新闻已成旧闻，然而，在报道中日交往中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依然恍如昨日。

发自东京的第一条新华社电讯

1954 年 10 月末，中央决定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新华社派我以随员名义参加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央非常重视。当时，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美、日、蒋都想破坏和阻挠代表团访问日本，此行是经过日本友好人士和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团员。总理说：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

那时，北京东京之间没有任何航班，必须从香港转机前往。为防止敌人破坏，代表团在香港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派红十字会的联络部长、代表团成员纪锋同志和我作为先遣人员早两天到达东京，作些准备工作。

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受到了极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日本友好团体和进步力量派出的青年小组，自称是“人民警察”，全心全

意地保卫着代表团的安全。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察负责警卫工作。一时出现了官民同保卫代表团的场面，据说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动人的场面强烈地冲击着我这个新闻记者，但以代表团随员身份能否作新闻报道呢？再说要用一般电报发几百字的新闻稿，费用也十分昂贵。于是，我请廖副团长同意我出去闯闯，摸摸路子。这位新华社的老社长立即同意了。经过亚细亚通信社社长李铁夫（老华侨）的介绍，我得到了共同社专务理事岩本清先生的大力协助，弄一张由日本外务省发给的记者证，凭它可以发新闻电，由收报人付费。这下子我“活”了，立即向总社发出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达东京受到日本各界隆重欢迎的新闻。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到达东京的第一条新闻，也是新华社记者从东京发出的第一条电讯稿。

“八芳园”之宴

1955年3月末，以外贸部副部长、国际贸易促进会代主席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与日方举行谈判，并签订第3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这一次，《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中国》均正式派出记者并编成记者组随团采访。总社派任丰平同志和我参加。

前两次贸易协议，由于日本政府未予支持，未能充分实施。为使中日民间贸易再上一个台阶，就要促使日本政府出来承担责任。因此，中央决定了“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代表团此行既要接触财界，也要接触政界，并在第3次贸易协议中有所体现。如何在报道中体现这一方针，成了记者组反复琢磨和商讨的事。

代表团到达东京的初期，不仅官方没有露面，与财界上层的接触也很少。原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向日本施加压力，说

“如果日本大企业积极扩大对华贸易，美国将重新考虑美日经济关系”。于是，日本外务省向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访的责任机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提出要求，说“政府考虑到对外关系的影响”，“希望代表团的视察限于东京、大阪、神户”。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怕得罪美国，避开了同代表团的接触。

这一形势也给我们的报道造成了困难。记者组把注意力及时转向日本朋友，看他们怎样打开局面。他们动员了各方力量，设计了以民间团体出面宴请，政府要人参加宴会的方案，以提供代表团与日本官方、财界交往的机会。宴会设在东京著名的日本餐馆“八芳园”。我们事先了解到，除政府要人出席外，鸠山首相也要到会。“八芳园”之宴成了我们在报道中体现“官方挂钩”的一个场面。

宴会开始后，日本通产相石桥湛山、经济企划厅长官高崎达之助，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等陆续到达。雷任民团长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在热烈掌声中走进宴会厅，同日本政要会晤交谈，气氛友好。但没有见到鸠山首相。日本朋友告诉我说，石桥湛山曾向鸠山首相进言，要他“不要理会美国的意向”，所以一直等到宴会结束。“八芳园”之宴，反映了鸠山内阁的实际情况：它既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又要照顾到美国的要求，它的步子是有限的，“官方挂钩”也就“挂”到这种程度，我们的报道既要体现方针也要反映实际。当然，关于贸易协议的谈判和代表团的的活动，都是成功的。但从日本政府对中日民间贸易的态度仍留着“八芳园”之宴的痕迹。

历史性的时刻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经过中日双方会谈，于29日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秋高气爽，枫叶为丹。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小平副总理为参加这一仪式访问了日本。我作为记者团的成员，随邓副总理一同访日。

从甲午战争起的50年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国损失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蒙受了难以计算的财富损失。这种黑暗时代随着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而宣告结束。但从法律程序上说，只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批准和生效，中日之间才是名副其实地结束了战争状态。而举行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和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高级领导人在二战后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并参加条约批准仪式，确实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时刻和大事。总社对这次报道极为重视，派出以曾建徽同志为首的强大的报道组随行采访，住在与东京赤坂国宾馆邻近的新大谷饭店，昼夜奋战。

10月23日，这一时刻来到了。

9点30分：福田首相在赤坂国宾馆举行欢迎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10点30分：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举行；

12点30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皇宫正殿竹厅会见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

15点30分到17点25分：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我们记者组紧紧地盯着这一时刻的每个情节，紧张地进行采访，每个人都为有幸报道这些历史性的大事而兴奋。我们认识到自己不仅在发新闻，也在写历史。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的会场中央，放着由白色、黄色的菊花和红色石竹花组成的日本

国的太阳旗和中国的五星红旗。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坐在用绿色呢绒罩着的大长桌后面，在批准书上签字，然后交换批准书。接着，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讲话，并举杯共庆条约的生效。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副总理和福田首相、园田外相互相拥抱。

这是 12 亿中国人民和 1 亿日本人民的历史性拥抱！

这是向全世界宣告：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

吴学文，男，满族，1953 年从事新闻工作，数次出任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委，现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研究员。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刘德有

1972 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战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为两国关系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中日复交，是周恩来总理落实毛主席国际战略部署取得的重大胜利。从日本方面来说，是田中角荣首相顺应民心 and 时代潮流，一改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推行的反华政策，作出决断，要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结果。当时，我正在新华社东京分社工作，有幸在日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

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前后

我是 1964 年 9 月，作为中日间互换的第一批中国记者，到日本常驻的。当时，我们对外用“中国记者团”的名义，但实际上从那时起在东京建立了新华社分社。

我们到日本时，正值池田首相患喉头癌，不久，池田辞职。经过自民党内各派势力的讨价还价和明争暗斗，最后决定由佐藤荣作担任新一届首相。

佐藤一上台就追随美国一味反华，进入 70 年代后他的对华政策明显地走进了死胡同。自从 1970 年秋季以来，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世界上承认中国的国家顿时增加。到了 1971 年，情况有了更大的变化。这一年的 7 月，我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参加了新华社为驻外记者举办的学习班。16

日上午我们正在学习时，突然听到新闻广播，说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并宣布美国总统即将访华。这一特大消息不仅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而且对日本的当政者也是一个巨大“冲击”。美国事前没有跟它的盟国——日本打招呼，只是在3分钟前通知了日本当局。在外交上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却不向盟国提前打招呼，这怎能不使佐藤荣作感到恼火和心焦呢？日本当局惊呼这是“越顶外交”。

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佐藤内阁也一直按美国的意志行事，百般进行阻挠。然而，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不仅出乎佐藤的意料，而且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进入1972年后，佐藤内阁在内政外交上陷入了更大的困难，呈现出“末期症状”。这一年的6月17日佐藤首相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上终于宣布辞职。

佐藤荣作下台后，日本政局的焦点转为由谁来担任下届首相。这成为当时我们采访的重点。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裁竞选中能够取胜，羽毛已经丰满的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内开始了争取多数的工作，日本政界借用中国战国时的说法，把这称为“合纵连横”。田中角荣与自民党大平派结成联盟，进而又把三木派拉到自己一边，形成了“三派联合”。后来，中曾根派也加入了进来，形成了“四派联合”。明眼人一看便知，“三派联合”也好，“四派联合”也好，其核心是田中派与大平派的联合，目的是要阻止佐藤支持的福田赳夫当选。

“四派联合”形成后，在东京举行过“鼓励田中角荣的会”。支持田中的各种力量的代表在会上讲话，鼓励田中角荣加油，争取当选自民党总裁。田中也在会上致词，答谢各方对他的支持。这种“鼓励会”，一般都采取酒会的形式。快要散会时，田中的

大秘书早坂茂三把我们中国记者介绍给田中角荣。田中满面红光，兴致勃勃。当他知道我们是中国记者时，高兴地跟我们握手，嘴里不停地说：“噢！噢！”

在“四派联合”中，大平正芳先生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人们都说，他跟田中角荣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两肋插刀”。在对华关系上，田中肯定要听大平的意见。我们提出希望会见大平先生的要求后，大平先生要我们到“宏池会”即大平派的事务所去会见他。“宏池会”的事务所设在东京虎门附近的“自转车会馆”里。我们坐在沙发上，向坐在对面的大平先生提了几个问题，他都一一认真地回答。当我们问到大平先生打算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时，他沉思了一会儿，极其慎重地选了一个外来语“negotiation（意为谈判）”，说“这个问题，我相信通过‘negotiation’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大平先生回答得不具体，我们又重复地问他到底打算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仍重复原来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我相信通过‘negotiation’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通过这次采访，我感到大平先生在台湾问题上早就有所考虑，或者说早已“胸有成竹”，认为经过双方诚挚的谈判，总可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不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便明说，所以就故意用了外来语。

日本报界透露，自民党将在7月初举行临时大会选举新首相。到了6月下旬，我们综合各方情况，加以分析，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大一些。据我们知道，当时国内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心，通过各种渠道也在多方摸情况，并有一个初步判断。但看来也是估计了两种可能性，因此，非正式地传到我们那里的信息，一会儿说是田中角荣，一会儿说是福田赳夫，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还感到，越是临近选举，传来的信息就越倾向于福

田。

作为“第一线”的记者，我们深知在这种时候应该发挥“观察哨”的作用，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及时报回国内。尽管后期从国内传来的信息，说福田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我们还是坚持了我们的判断，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极大。不过，考虑到事情总有“万一”，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太死，就在后面加了一句：也不排除福田当选的可能性。当时我们想，这样，“保险系数”大一些。

1972年7月5日，自民党经过二轮投票，田中角荣以282票当选为自民党新总裁。获胜后，田中走上台去，简短致词，感谢各方支持，并表示了决心。

7月6日，第69届临时国会举行首相选举。由于自民党是多数党，田中角荣自然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是战后第11位总理大臣。当时，田中才54岁。

田中当选首相后，立即着手组阁，于7日下午组成了第一次田中内阁。内阁中的主要成员是这样安排的：三木武夫为无任所国务相（副总理），大平正芳任外相，中曾根康弘为通商产业相。

田中角荣在总裁选举中获胜后，我们作为记者，把采访的注意力立即转到追踪田中内阁将要推行的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来。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最快的消息来源，是日本共同社的新闻稿和电视新闻。我们从新闻稿中，看到田中角荣通过公开讲话，表明了要同中国复交的决心。

7月5日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会见记者讲话时，就涉及到日中关系。他说：“战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日中关系，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为了不再发生纷争，要以认真的态度着手（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工作。以往我们单方面地给中国添了麻烦，但是，我认为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7月6日田中组阁后在当天傍晚举行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发表

讲话，又一次谈到日中关系问题。他说：“在外交上，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面对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我们要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大平正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在就任外相后会见记者时说：“内阁才刚刚成立，还没有决定今后政治活动的日程。”但另一方面又说：“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由首相或外相访问中国，将是必要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日中邦交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到结束这一谈判时，我认为，日台条约的存在是不可想像的。”当记者问到新政权在对华外交上与佐藤政权有何不同时，大平外相回答说，“我们下定决心，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至于与福田前外相的对华姿态有何不同，请你们仔细观察今后的行动。以往的外交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只要跟美国采取统一步调就不会错，但今后即使有风险，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事。”大平正芳做事、说话，一向十分谨慎，但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从来没有像这样引人注目地表现了积极态度。

无论是田中首相的就职演说也好，也无论是他和大平外相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也好，都明确地宣布了田中内阁下决心要尽快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这在战后的日本内阁中，还是第一次。

7月10日清晨，我到办公室，看到新华社在日本的发稿站——“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闻稿，引起了我的注意。新华社报道，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发表讲话时有一段话专门提到田中内阁的成立，说：“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我当时想，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本来与日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周总理抓住时机，在这一讲话中立即表示响应，向田中内阁迅速地发出了信息。这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愿